



公共管理学术前沿文库

大学的起源与演进

——组织视角下的历史和逻辑

张正军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公共管理学术前沿文库

大学的起源与演进

——组织视角下的历史和逻辑

张正军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的起源与演进:组织视角下的历史和逻辑/张正军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7

(公共管理学术前沿文库)

ISBN 978-7-5161-6432-7

I. ①大… II. ①张… III. ①大学—历史—研究—世界 IV. ①G64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46909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冯 斌

特约编辑 丁正军

责任校对 韩晓超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36.25

插 页 2

字 数 613千字

定 价 118.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受到如下项目的资助：

西北大学“211工程”

陕西省普通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特色学科建设项目

（基于合作收益的公共管理学科建设）

公共问题研究文库

编委会

主任 曹 蓉 雷晓康

委员 (按姓氏拼音字母排序)

何君安	黄新荣	梁忠民	刘文瑞
席 恒	许 琳	杨九龙	杨选良
杨玉麟	张正军	郑子健	周 明

总 序

“全面改革”、“深化改革”是我们党和政府面临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改革的过程中，很多公众所关注的公共管理问题都会被提上议事日程并进入决策者深化改革的序列。这些问题涉及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各个领域，比如：与社会公众生命和财产密切相关的应急管理问题、与国家战略相匹配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造成消费者剩余损失的垄断问题、关乎社会公平的公共服务供给均等化问题、保证政府公信力的执政能力提升问题、影响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问题、关乎民生的养老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顺利解决不仅能够增加人民群众的福利或福祉，更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长期稳定。

关注理论前沿和研究社会热点问题是学者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对以上诸多公共管理问题的深入研究不仅能够促进学科的理论创新，而且也能够为改革的决策部门提供智力支持。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在公共管理领域的教学与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是全国最早涉及此领域的院校之一。三十多年来，学院紧跟公共管理的理论前沿，围绕中国公共管理特别是西部地区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了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的探索，形成了公共行政学、社会保障学、公共政策与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以及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为核心的五个学科方向，并在上述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进展。为了与大家分享已有的研究成果，我们以“公共问题研究文库”的形式将其结集出版。希望能够以该文库为载体，有效传播西北大学在公共管理领域研究

2 大学的起源与演进

的新观点和新思想，并为公共管理学科学术资源的积累、学术梯队的培养贡献自己应有的力量。

公共问题研究文库 编委会

2013 年 12 月

自序

作为知识传授和创造的集散地，大学通常是令人留恋或向往的。有人对其充满温馨的回忆，有人对其怀抱幻想与期盼。谈及大学，人们脑海中可能会浮现各式各样分散或组合的印记，也许会把大学和一系列熟悉的专名如“牛津”、“哈佛”或“清华”、“北大”联系起来，进而想到宽阔漂亮的校园、满腹经纶的教授、青春活泼的学生、激扬文字的课堂，或其他令人难忘的校园景象和轶事。一些人也许想到某个大学的历史或坐落的地方。譬如，谈及“牛津”，可能想起泰晤士河畔的小镇，矗立于小镇上年代久远的建筑，以及活跃于这些建筑中声名远扬的学院；谈及“哈佛”，可能想到波士顿的剑桥镇，约翰·哈佛捐书的故事，还有拒绝授予以根总统博士头衔的轶事。谈起“北大”或“清华”，可能想起北京的中关村，秀丽的未名湖或典雅的清华门，任人唯贤的校长蔡元培，或荷塘月色下的朱自清。对于那些有过大学经历的昔日学子，最容易想到的自然还是留下自己生命足迹的校园学习与生活的记忆。普通人对大学的第一反应也许就是此类印象和记忆的浮现与叠加。

我因为学习、工作、研究或访问经历，对许多大学也印象深刻并心存感激。北京师范大学的西南楼，西北大学的中德所和公共管理学院，武汉大学的珞珈山和哲学系，伊利诺伊大学的东亚与太平洋研究中心，陕西师范大学的国际商学院和社会科学处，香港中文大学的逸夫书院和“天人合一”，密西根大学的钟楼和法学院图书馆等，都给我留下难忘记忆。毫无疑问，这是一种表象意义上对大学存在的感知与描述。如果大学是被考察或讨论的对象，表象的方式可以将人们引向大学生存的物理空间，但难以说明大学存在的组织形态或方式，更难以说明大学存在的理由。作为一

种组织形式，大学具有一般组织共有的特征，如都是怀有某种目的的人的集合，有自己的理念、使命和目标；都在一定的关系模式中工作和运行，并运用一定的知识和技能；都划分为不同的部门或层级，有着不同的岗位职能和分工；都存在计划、组织、激励或控制等管理活动，与社会发生着千丝万缕的互动关系。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大学也具有和其他组织不同的性质，如以知识传播为首要职责，并在演进中将知识生产内化为自己的职能。为了实现组织使命，大学发展出与中学、职业培训机构不同的教育技术，创造出与企业、政府有别的组织结构、组织文化、运行方式等异质性。对于这类特殊性的揭示和理解，靠个人体验和感性直观远远不够。表象的方式可以使日常生活中的闲谈、议论或对话富有成效及魅力，满足人际交往和对象识别中初级的信息需求，但这种信息所传递的，大多只是大学存在的部分片断或现象，难以统观大学存在的整体和本质，更难以揭示大学内部复杂的结构、功能、运行机理，以及大学存在的根据和演进规律。

二

对于数量众多、规模庞大、有着悠久历史和丰厚社会价值的大学存在，人类的认识自然不应停留在日常生活中的现象描述。自欧洲中世纪大学产生后，在长达八百多年的演进中，已有不少论著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对大学问题的理论反思，检索教育史文献很容易印证这一点。令人遗憾和费解的是，高等学校的存在虽然历史悠久，养育了一代又一代学术精英，像巴黎、牛津和剑桥一类经典大学的出现也有七八个世纪的历史，在浩如烟海的教育文献中，却较少出现组织学意义上逻辑缜密、分析深刻、产生广泛影响的大学研究的经典之作。这与人文社会科学对于其他组织如企业、政府的研究形成反差。耐人寻味的是，致力于这些组织现象研究的学者，多数恰好就是大学校园的教师。为什么教师们的研究在组织类型的选择上如此不均衡？他们的学术视野又何以偏离自己生存的组织而对其他机构饶有兴趣？对此类现象和问题，从认知偏好或学术兴趣的角度难以得到彻底回答与解读。和其他人员相比，教师们的确更有条件对大学现象说三道四。如果问谁在大学研究和理论产出中最富有潜能和效率，理想的群体应当是有丰富校园生活阅历的大学教员。

假若我们不拘泥于纯粹的认识框架，不把研究者单一地看作认识主体，而同时看作一个利益诉求的主体，便可能发现隐藏在这种选择性偏好背后、影响大学教授行为的另类根源，其中之一是支配教师们认知行为的功利动机或对利益关系的种种考虑。无论是过去还是现代，受社会环境及生存法则的压力和影响，学术研究在大学校园的发展始终带有一定的实用色彩。和单纯认知行为中的释疑解惑不同，基于实用性的研究行为，其最终目的不在于认识事物，而在于借助认识获得一定的预期收益。政府或企业在提供这种收益中远优于大学。就研究环境而言，身临其境的校园学者直接面对的是自己赖以生大学的组织，这种组织与研究者具有比其他外部机构更紧密的利害关系，并因此对研究者的学术自由产生无形的约束和压力。与此同时，在高等院校这个学者密集的场所，每一个教师对自己熟悉的大学都可品头论足，任何关于大学研究的观点都易受到同行们的苛刻评议和诘难。正是这些利害关系方面的顾虑，大学研究在杰出的组织理论家那里，一直遭到慢待或冷遇。一方面是众多的学术精英将精力和时间投入其他社会组织问题的研究，一些人为了承揽此类项目不惜随企业和政府起舞，改变自己的学术兴趣和路径；另一方面则是寥寥无几的一流学者自甘寂寞地致力于大学组织的系统分析，以致有人讥讽道：大学什么都研究，唯独不研究大学自己。

三

大学研究的组织维度虽然因利益关系的约束缺乏激励，但利益约束并不是研究萧条或落后的全部根源。旧有研究的不足还显著地受到学者们方法论的制约。文献梳理容易发现，已有研究对大学的关注多限于大学行为的构成方面，在教育思想、教学规律、教育政策、教育环境、教育管理及教育史学等多个专门领域，获得了广泛的学术认同。和企业或政府研究不同的是，历史悠久的大学研究虽成绩斐然，却缺乏组织界面上得力的系统考察。这给大学研究带来诸多的不便和困难。不像企业或政府研究那样有相对稳定而统一的研究纲领，对组织分析的漠视不仅使大学研究缺少独立的学科范畴和分析框架，而且时常模糊了大学存在的层级和边界。学科范畴和分析框架的局限又制约了统一的大学理论的建构，使不同研究者的学术活动及其观点难以有效地比较和通约，并因此激励了大学研究的碎片

化。组织分析利于整合各种研究的片段，大学存在的边界和层级会因此变得清晰起来。作为人的集合，组织有其约定的使命，围绕使命形成自己独特的结构、功能、文化、管理及环境，它们耦合成一个关系紧密的系统，以和生物有机体类似的形式存在并行动。在此意义上我们会发现，大学不仅是一种对象性存在，也是一种主体性存在，是一个有其生命规律的行为主体。当人们将大学作为组织考察时，这种主客体二重性便会凸显出来，统一研究纲领的形成才变得更有希望。恰恰在这个方面，传统研究所做的工作十分有限。

事实上，忽视组织分析对大学研究带来的损失是多元的，不仅导致了大学研究的松散性，限制了统一研究纲领的形成，也抑制了学者们对大学作为行为主体的进化分析，弱化了对大学组织层级结构的分析和认同。大多数正式组织都是理性存在和自然存在的统一。组织理论的发展已深入到对理性存在和自然存在特点的详微分析和概括，但大学研究在许多场合仍旁若无人地将应然和实然状态混为一谈。当有人断言大学的使命在于知识传授、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或将学术自由、全人教育、教授治校视为大学运行的理念时，很难区分他刻画的究竟是大学现存的实际性状，还是人们期盼、预期的理想或未来状态，而这种区分对大学运行和管理的影响又是如此地显而易见。少数意识到实然与应然状态不同的人，在大学存在的认知上也多采取了片面态度。理想主义者大多从理性期盼的角度对大学究竟是什么进行诠释，并据此对已有大学的存在开展评价。现实主义者则基于已有的事实，使其研究具有突出的描述性特点。史学文献对大学的诠释就具有这种描述性。由于关注大学所是的状态，这类文献对大学存在缺少自下而上的发生学分析，这使得传统研究多停留在社会环境、杰出人物、法律政策、科技进步等外生变量或中间变量的考察，较少顾及决定大学命运的各方参与者利益集团的动机、行为及博弈。

四

由此看来，对大学存在及性质问题的研究想取得新的突破，需要研究者在积极性和方法论方面有所改进。就前者而言，需要大学、政府、社会及个人多方的协同努力，营造一个关心并积极探究大学问题的激励氛围；解除教师们研究自己从属的组织并对其进行批评的顾虑，保证他们对大学

问题的探讨及其学术自由免受各利益集团的不当干预。就后者而言,汲取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以及企业和政府研究的相关成果,加强大学研究的组织学考究与分析,则是认识进步的关键一环。毋庸讳言,这是一个艰巨的系统工程。即便在学者们能够控制的认知范围,也需要我们在组织理论框架下做深入细致的梳理工作和考察。大学作为组织有机体的整体特征及其各构成要素间的相互作用与依存,要求研究者必须将大学存在的多个方面联系起来,从大学作为组织的使命、理念和目标,大学的结构、功能、运行与管理,到大学兴起与演进的根据,以至大学与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在组织系统的框架内予以鉴别和认知,分析并发现它们之间的关系逻辑,以此为前提对大学的存在与性质进行诠释。

如果人们仅仅出于认知方面的原因思考大学,方法论的这种改进无疑会提高我们的认识水平。我所计划和期盼的研究工作,便是基于方法论上的这种考量,对大学存在与性质给予的一种系统性分析和解读。在长期的校园生活中,我目睹并体验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学变革的每一个重要环节,也通过国际交流、访问和间接经验了解到海外大学发展的主要历史和现状。令我感悟深刻的一个印象是,大学实际的存在状况非常不同于教科书上的一些记载和媒介的宣传。在许多情况下,学界、媒体、校长和教育官员们对大学的解读具有高度的选择性。这种选择可能来源于我们认识水平的局限,即对大学的研究尚未达到像企业和政府研究那样的程度;但也不排除这种选择与学科划分带来的研究方法的局限有某种关联。在过去的历史中,大学研究或者多是高等教育或教育心理学专家的职责,或者主要为教育史学家的主业。大学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组织现象,并未引起组织学专家和交叉学科研究者的足够关注。如果大学研究想取得新的进展,组织分析和交叉学科研究是应当重视的一种维度。在组织分析框架内,教育学、心理学、历史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甚或哲学,都可能以交叉学科的形式为大学的诠释做出贡献。

五

从组织角度研究大学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路径。其一是结构决定功能的逻辑,据此逻辑,欲了解一个时期大学的行为,可考察大学的结构特征及其制度安排去达成。另一种是功能决定结构的逻辑,据此逻辑,欲了解

一个时期大学的结构或制度特征，可从行为分析入手来实现。依据功能与结构事实上的相互作用，我们的研究自然想汲取两种逻辑的优点，但更加看重功能对结构的影响和意义。功能决定结构的逻辑较好地刻画了大学作为一个有机体的存在与演化特征，也利于在大学组织与社会环境之间搭建一座彼此沟通的桥梁。组织分析不仅为吸收多学科的成就提供了便利，也会使大学研究变得微观、具体而边界清晰。基于政府行为及其干预的宏观政策研究也十分重要，但可以作为大学之外的影响因子，和其他环境因素一起给予考量。在研究趋向上，组织分析和多学科交叉研究在我们的意图中是一致的。虽然这不能保证研究的可靠性，但无疑会拓展大学理解的视野与深度，我们期望因此能使大学研究更接近真理。

基于高等教育的现存问题和国际竞争的压力，中国需要开展或拓展这样的研究，据此回答困扰我们民族的急迫问题，如怎样才能使危害巨大、日益浮躁的学术风气得以扭转？中国大学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什么是国家政策应当鼓励和支持的好大学或好教授？什么是中国大学应重点建构的竞争力或治理结构？中国大学如何处理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以确保在政治干预和市场化浪潮中不迷失方向？回答并解决这类问题的前提之一是，我们需要对大学组织的存在与性质有系统而深刻的了解，在此方面，中国高等教育现有的理论和实践似乎仍力不从心，这形成了一种令人心动的研究地带。在实践需求和学术感召的双重激励下，从2005年开始，我着手致力于对大学组织的微观探讨，拟订了一个私人计划，试图在组织界面上对大学的存在与性质做系统探究。该研究力求形成的学术特点和目标是：将大学视为一个以传授和创造知识为核心职能、在社会环境中生存演进的组织，融组织分析、历史分析、发生学分析、经济分析等于一体开展研究，通过对大学组织的综合分析，揭示其存在的性质及规律，为大学制度的优化设计和管理改进提供理论基础。与此同时，借助系统的理论分析，向关心大学的人们澄清一些看似简单却显得混乱的基本问题，如什么是大学存在的理性形式，什么又是大学存在的自然形式？除了人才培养或教育，大学发展与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间有什么规律性的关系？大学教师及其管理者应当如何看待并处理教学、研究和社会服务间的关系？

《大学的起源与演进》是我围绕大学组织研究计划的一部分，旨在为其他研究提供分析利用的事实前提。全书共分为八章。第一章为导论，讨

论大学研究的认知方法和本书的方法论选择及关于大学理念与性质的基本观点。涉及大学诠释的理性主义、自然主义和历史主义的特点或局限,表达了笔者对大学演进规律新的概括和判断。第二、三、四、五章为史论,分别对前大学时期的高等教育、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兴起、近代大学的渐变及现代大学的发展,按历史顺序进行论述,讨论了各历史时期典型大学组织的影响及特点。这四章的内容总体具有梳理和描述性质,工作成效多建立在他人已有文献的基础之上,笔者的新贡献主要体现为对各阶段大学存在特点和影响的分析与判断。第六章以新制度经济学为基本工具,从进化的观点、知识的供给和需求、集体行动的逻辑、交易费用观点以及管理控制与激励的效率优势等维度,对大学存在的理由进行了多层次的微观分析,表达了笔者关于大学何以兴起并长久存续的主要观点。第七和第八章以历史分析为基础,对大学与社会的动态关系进行总结和概括,阐述了大学存在与演进的若干特点和规律。内容涉及大学对社会的独立性和依赖性,大学演进的动力和社会化形式,以及科学、宗教、政治和经济对大学具体的影响和作用方式。

六

本书的形成凝聚着许多人的智慧和辛劳,也包含着诸多的鼓励和期盼。作为本书的作者,我感谢对本书形成做出贡献的所有人员和机构。首先要感谢为本书研究提供养料的众多参考文献的作者,他们的研究和争鸣不仅给本书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启迪和参考,也为本书的论证提供了有价值的文献和指南,没有他们的研究成果,就不可能有本书的动议、写作和完成。其次要感谢参与本书写作计划讨论及阅读本书手稿并提出修改意见的师长、朋友和同事,尤其是张富昌教授、任宗哲教授、睢党臣教授、薛冰教授、席恒教授和毛希明先生,他们的评论、指点和意见不仅使本书避免了一些知识性错误,也使观点的表达和论述更趋严谨与清晰。我要感谢为本书出版辛勤劳动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冯斌编审及其他人员,他们以热情的态度接纳了本书的出版请求,并以高度的责任心对书稿进行了认真审阅和编辑,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对笔者关于版面设计和图书质量的偏好也给予了正面肯定和积极回应。在学风浮躁和知识活动日趋商业化的今天,这种精神已足以使那些仍在学术领域默默耕耘的留守学

者，感到一丝温暖和希望。我要感谢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曹蓉教授、副院长雷晓康教授以及其他同事为本书出版付出的努力，他们的关心、帮助及沟通、协调工作，消解了诸多本应由我直面的烦恼。我要感谢西北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211 工程”和公共管理学院为本书出版给予的动力和资助，正是基于学校和学院学科建设的需要及鼓励政策，促使我将投入多年的高等教育组织研究课题的一部分整理出来，形成这本独立的书稿。我也要感谢我的妻子和女儿，她们一如既往的理解和支持，是我在清贫书斋里寂寞耕耘的重要支柱。

由于本人不是教育史专家，写作本书的主要目的不是要以史学家的眼光整理、发现并解释高等教育史演进的史实，而是以一个对教育组织特别是大学制度有学术兴趣的组织理论、组织经济和组织管理问题研究者的身份，期望通过对大学演进史的梳理和解读，探究大学作为知识生产与传授组织特殊的存在机理，揭示大学运行中集体行动的规律及其与社会环境和师生员工诸利益相关者间的互动关系，寻求有效改进和管理大学的一般规律。故本书对历史现象的描述，包括教育实践和理论的认知，大都建立在已有史料和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如果这种描述或认知有什么可取之处，首先应归功于为本书提供养料和启示的其他学者所做的工作。我所付出的劳动主要是通过研读已有史学文献，对前人的工作进行概括和总结，从组织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多学科交叉的观察维度，解读大学演进的特点、机理和动力，探究大学为什么兴起和延续，以期揭示大学存在的理由、性质和规律。为此，我必须再次感谢并声明，那些为本书写作提供养料和启示的所有参考文献的创作者或供给者，他们的劳动成果不仅是本书研究的基础和条件，也是本书史料知识的一个来源，对于众多已逝的历史现象，我是通过他们传递的信息进行思考和认知的。

七

为表达对这些知识产品及供给者的尊重和感谢，本书努力通过脚注、参考文献等形式予以说明，但因常年浸淫在各种文献中，许多前人的思想、观点乃至语言表述，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已融入笔者的精神世界和话语系统，未必都能清晰意识并找到其原始出处。为预防或弥补这一现象可能造成的过失和疏漏，我想对如下文献的作者及翻译人员致以特别感谢，这

些文献为本书的形成或提供了入门向导和概念框架,或提供了重要的史料知识和启迪。它们主要是:希尔德·德·里德—西蒙斯主编《欧洲大学史》(第一卷,中世纪大学,张斌贤、程玉红、和震、张弛、王海芳等译;第二卷,近代早期的欧洲大学,贺国庆、王保星、屈书杰、张婷姝、张薇、金传宝译);海斯汀·拉斯达尔著《中世纪的欧洲大学》(第一卷,大学的起源,崔延强、邓磊译;第二卷,在上帝与尘世之间,崔延强、邓磊译;第三卷,博雅教育的兴起,邓磊译);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著《大学的兴起》(梅义征译);弗利德里希·鲍尔生著《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张弛、郅海霞、耿益群译);弗利德里希·鲍尔生著《德国教育史》(滕大春、滕大生译);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著《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徐辉、陈晓菲译);克拉克·克尔著《大学之用》(高钰、高戈、汐汐译)和《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王承绪译);伯顿·克拉克著《探究的场所:现代大学的科研和研究生教育》(王承绪译)、《研究生教育的科学研究基础》(王承绪译)和《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王承绪、徐辉、郑继伟、张维平、张民选译);伊丽莎白·里德姆—格林著《剑桥大学简史》(李自修译);雅克·韦尔热著《中世纪大学》(王晓辉译);亚瑟·科恩著《美国高等教育通史》(李子江译);米定斯基著《世界教育史》(叶文雄译);滕大春、戴本博主编《外国教育通史》(第一卷);滕大春、姜文闵主编《外国教育通史》(第二卷);贺国庆、王保星、朱文富等著《外国高等教育史》;俞启定、施克灿著《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一卷);宋大川、王建军著《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二卷);乔卫平著《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三卷);约翰·亨利·纽曼著《大学的理想》(徐辉、顾建新、何曙荣译);卡尔·雅斯贝尔斯著《大学之理念》(邱立波译);索尔斯坦·凡勃伦著《学与商的博弈:论美国高等教育》(惠圣译);希拉·斯劳特、拉里·莱斯利著《学术资本主义:政治、政策和创业型大学》(梁骁、黎丽译);理查德·鲁克著《高等教育公司:营利性大学的崛起》(于培文译);詹姆斯·杜德斯达著《21世纪的大学》(刘彤、屈书杰、刘向荣译);陈洪捷著《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和《中德之间——大学、学人与交流》;戴晓霞、莫家豪、谢安邦主编《高等教育市场化》;郭为藩著《转变中的大学:传统、议题与前景》;邓洪波著《中国书院史》;高奇著《中国高等教育思想史》;金耀基著《大学之理念》;加里·S. 贝克尔著《人类行为

的经济分析》(王业宇、陈琪译);曼瑟尔·奥尔森著《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W. 理查德·斯科特、杰拉尔德·F. 戴维斯著《组织理论:理性、自然与开放系统的视角》(高俊山译);赫伯特·西蒙著《管理行为》(杨砾、韩春立、徐立译);杰克·J. 弗罗门著《经济演化:探究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李振明、刘社建、齐柳明译);R. 科斯、A. 阿尔钦、D. 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胡庄君、陈剑波、邱继成、刘守英译);R. K. 默顿著《科学社会学》(鲁旭东、林聚任译);道格拉斯·C. 诺思著《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译);道格拉斯·C. 诺思著《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刘守英译);弗里蒙特·E. 卡斯特、詹姆斯·E. 罗森茨韦克著《组织与管理》(李柱流、刘有锦、苏沃涛译);M. K. 穆尼茨著《当代分析哲学》(吴牟人、张汝伦、黄勇译);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主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Olaf Pedersen, *The First Universities: Studium Generale and the Origins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in Europe*; D. G. Apte, *Universities in Ancient India*; Hartmut Scharfe, *Education in Ancient India*; Henry Malden, *On the Origin of Universities and Academical Degrees*; Walter Rüegg (general editor), *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in Europe* (Vol. 1—4); George Weisz,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Universities in France, 1863—1914*; Hunt Janin, *The University in Medieval Life: 1179—1499*; Ted Tapper, David Palfreyman, *Oxford, the Collegiate University*; Radhakumud Mookerji, *Ancient Indian Education: Brahmanical and Buddhist*; Anthony Preus,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Ancient Greek Philosophy*; Gabriel Compayre, *Abelard and the Origin and Early History of Universities*; Robert Birnbaum, *How Colleges Work: The Cybernetics of Academic Organization and Leadership*; Derek Bok, *Universities in the Marketplace: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以及其他数量众多的中英文文献。

我还要特别感谢众多网络机构提供的信息搜索平台以及密西根大学的间接相助。互联网特别是谷歌和百度为笔者检索文献以及了解、查阅、核实信息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本书脚注中有关人物简介一些内容的核查,就利用了互联网维基百科的信息平台。密西根大学不仅以其丰富的图书资源为本书写作提供了参考文献,而且以其优美的学术环境给身临其境的我从事写作以精神激励。笔者有幸于2011年和2013年两度以私人访问者身份